

缪荃孙、丁丙等有关地志族谱文献的手札六通

张廷银

笔者在整理国家图书馆馆藏方志家谱文献时,得观书中夹附或粘贴的几通函札便笺原件,分别是:缪荃孙致章钰、丁丙致沈闾岷、许同莘致傅增湘、王祖彝致陈垣、郑恒谦致张涛卿、〔〕端致朱启铃。它们虽然只是主人向对方赠书时之附笺,但均或具体或整体地涉及地志与族谱文献的编纂、刻印、鉴赏与藏存,揭示了相关文献从内容到外装到流传等方面的信息,其中还寓含了丰富的历史与文化意义,对于我们了解文献及相关的人物和事件,均有重要价值。故撮列一起予以披露,并加按语对其中的人、事、书略作介绍。

一、丁丙致沈闾岷(图见封二)

肖翁老伯大人侍右:昨奉手示,承赐瑶章,感诵之余,谨以奉报,幸勿哂也。《舆地图》前在蒋泽山处见一抄本,精妙无匹,与此本同,或谓即亭林先生《郡国利病书》之首图也^①并非亭林之图,此说属误。余竢趋罄。肃敬道福。侄期丁丙顿首 初三

按:此函粘贴于国家图书馆所藏钞本《舆图要览》之扉页处,用印有“天寒有鹤守梅花”字样之花笺纸书写。据书上铃盖的“东山外史肖岩沈氏藏书之印”、“沈闾岷印”等朱印,可知其为丁丙(1832—1899)致沈闾岷之函。沈闾岷,生卒年未详。著有《来青轩诗钞》及《来青轩文钞》。〔光绪〕《上虞县志》卷三“职官表”于咸丰年间的“教谕”条下记载:“沈闾岷,号肖岩,德清人,廪贡,八年四月任。”据此可知,沈闾岷祖籍浙江德清,咸丰八年(1858)时,尚在上虞县教谕任上。又,光绪六年(1880)刻本清人汪曰桢所撰《湖雅》,有沈闾岷于光绪三年为该书所写的序文。但查新旧《德清县志》,却没有关于沈氏的任何记载。其与丁丙之交往情形更无从得知。只从丁丙信中对沈闾岷自称为侄,就可以推测沈闾岷一定比丁丙年长,或者辈分比丁丙高。

信中所提到的《舆地图》即《舆图要览》,分别用朱、墨两色格纸抄写描绘,内容则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附录之《舆图要览》。丁丙致沈闾岷的函

^①原函此句之后有“奇门秘书首列吕祖乩语当非古籍并以缴上”,被删去,故本文亦不录。

中,把《輿地总图》视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之首图,是不准确的。笔者初步勘对,《輿地总图》在山东、河南、山西等道之前均有一总图,而《天下郡国利病书》则只有山川、书院等分图,并无总图。看来二者确非一事。而在该书首册的书衣上,则有墨笔题到:“明抄本。转录顾祖禹《方輿纪要》卷首,或即《纪要》之底本,亦未可知也。”“转录顾祖禹《方輿纪要》卷首”云云,或者是题记作者所看到的某一《读史方輿纪要》的版本情况,或者是因疏忽而发生的讹误,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各种《读史方輿纪要》中,《輿图要览》在其附录位置而非卷首。“或即《纪要》之底本”一句,倒是提醒我们应该重视这部抄本的价值,因为,在其页眉位置,多有校改批注之语,如在“江南总图”之“庐州府”条,原有“或南预州合州北陈都保信军”一句,而其眉批则曰“‘北陈都’一名‘北陈郡’”,现《读史方輿纪要》正作“北陈郡”。可见所谓底本之说,确有一定的道理,至少证明这是一部经过校改的抄本。

《輿图要览》中还夹有一份藏书签,印有“约园藏书”四字,并用墨笔写有“輿地总图”、“四册”等字;而在第一页和卷末则分别钤有“丰华堂书库宝藏印”和“杨复之印”。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大致可以推知这部《輿图要览》先后曾经沈闾岷、丁丙、张寿镛、杨复(1866—?)等人递藏。据有关资料介绍,杭州丁氏少量藏书后来也流入了杨氏丰华堂^①,《輿地总图》或即其一也。

二、缪荃孙致章钰(图见下页)

式之仁兄大人阁下:弟初七到常,十九旋宁,廿一诣谈,知未回,怅然而返。顷奉手书并承惠朱氏两种款识,谢谢。去年刻《竹汀日记》、《河南志》、《玉牒纪事》、《牛羊日历》、《真赏斋赋》、《刑统赋》、《孙渊如年谱》,先将印成者呈政,馀再致。此请升安。弟荃孙顿首

汇索小丛书前月使人带往。

按:这是缪荃孙(1844—1919)致章钰(1865—1937,字式之)的手札,粘贴于元修《河南志》之扉页处。缪荃孙和章钰均为江苏籍学者,且都嗜好鉴藏古书,所以平日往来极其频繁。在缪荃孙的《艺风老人日记》中,写到章钰的就有231处,他们的交情由此可见。这通手札没有时间说明,但据《艺风老人日记》,在宣统元年(1909)的一、二月间,缪荃孙曾有常州之行。在一月七日的日记中,缪荃孙写到“五鼓起,偕禄葆、僧葆^②赴火车栈”,又记“禄葆到常州下车”^③;十九日的日记中,提到“酉刻,过宁”之事^④;廿一日则云拜会章式之等人^⑤。

①刘蔷:《杨氏丰华堂考略》,黄建国、高跃新主编:《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中华书局,1999年,第145页。

②禄葆、僧葆为缪荃孙的两个儿子。

③《艺风老人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13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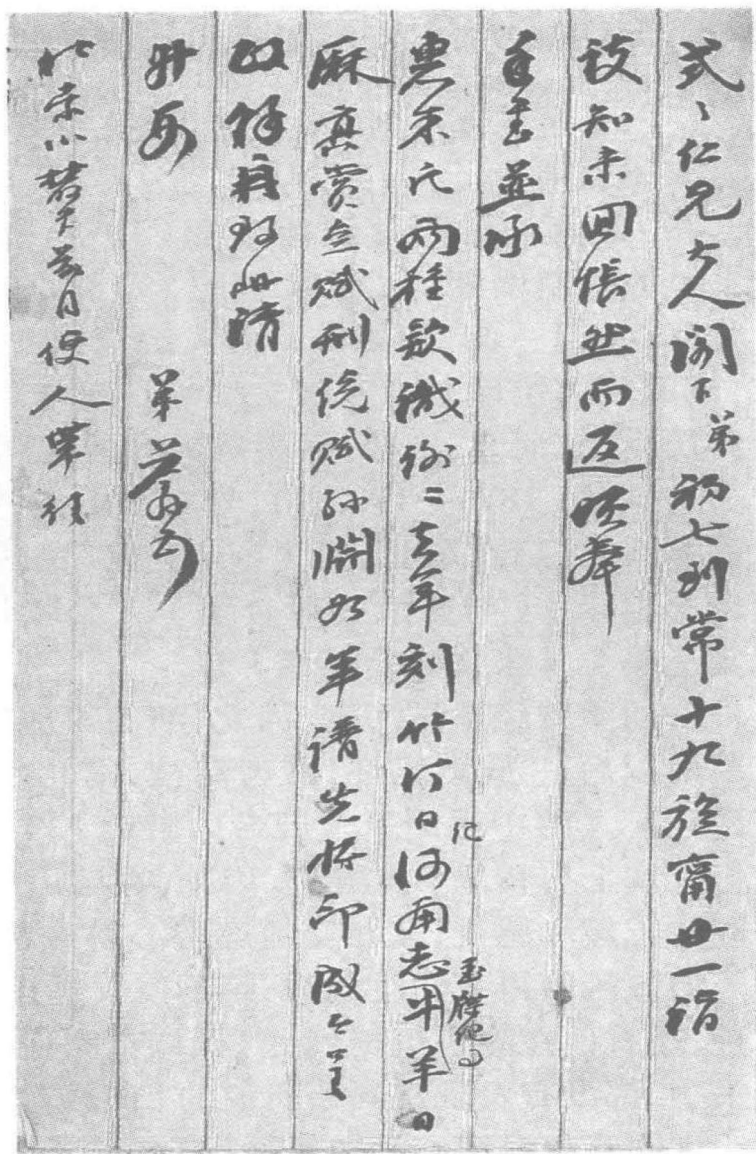
④⑤同上,第2140页。

这些行动及时间，均与信函中所说的相符。在二月三日的日记中，写到“送章式之新刻书”^①，二月二十八日则记“致章式之一束”^②。这样来推断，则这封信函极有可能作于1909年2月3日至2月28日之间。缪荃孙又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七日和十二日，分别写到“寄《河南志》两部”、“交《河南志》八部与张仲次带京”，将此与信中所说“去年刻《竹汀日记》、《河南志》、《玉牒纪事》、《牛羊日历》、《真赏斋赋》、《刑统赋》、《孙渊如年谱》”云云相对，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我们的推断。

元修《河南志》为元代佚名所纂，原本亦佚，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若干。缪荃孙得此志之钞本后，重新予以抄录和校勘，并于光绪三十四年前后刻入其所辑之《藕香零拾》丛书中^③。全书共四卷：卷一，京城门坊街隅古迹；卷二，成周城阙宫殿古迹；卷三，后魏城阙古迹；卷四，唐城阙古迹。清人沈垚《与徐星伯中书论〈河南志〉书》文中，对徐辑《河南志》的史料价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独藉此志，而隋唐东都制度，犹可考见其全，其当宝贵何如也。”^④缪荃孙精心校刻此书，自然是对其价值的进一步发扬光大。

三、许同莘致傅增湘

沅公总长赐鉴：山中承教，欣幸无既。旧作游记三种，专足送呈，芜陋



①《艺风老人日记》，第2144页。

②同上，第2152页。

③缪荃孙自编《艺风老人年谱》称，宣统三年（1912）《藕香零拾》三十二册成，信函中所提到的《竹汀日记》、《河南志》、《玉牒纪事》、《牛羊日历》、《真赏斋赋》、《刑统赋》、《孙渊如年谱》等分置于各帙之中，但却先于丛书中其他各书而刻成。

④转引自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辞典》，黄山书社，1986年，第60页。

不足观,聊述所见而已,惟海政是禱。专肃敬请道安。许同莘谨上 七月二十六日

《氏族谱略例言》一首,附呈鉴教。比年来所专意采辑者,时彦所谓违反潮流者也。

按:此函为许同莘致傅增湘(1872—1949),夹寄于许同莘所著《恒代游记》中敬呈傅增湘。《恒代游记》曾与许同莘所作另两部游记《嵩洛游记》、《盘山游记》一起,以《石步山人游记》的形式汇集刻印。合订及单行两种版式,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均藏有多部。三部游记著作分别记叙了作者游历京郊、河北、山西、河南等地时的见闻。

许同莘(1879—1922?),号石步山人,室名简素堂,江苏无锡人。清末为张之洞幕府。先后在东北、河北等地为官。民国后,居家专意著述,并编著有《外交部藏书目录》(与曹汝霖等合编)、《公牒学史》、《一个师爷的执笔经》、《简素堂丛稿》、《张文襄公年谱》等。

许同莘曾经巡游河套、河北、河南等地。而傅增湘亦有山水之情,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放意纵怀,屐齿筇枝,南北殆遍”^①,并编著有《衡庐日录》、《藏园游记》、《游中岳记》、《五台山游记》、《秦游日录》、《登太华记》、《南岳游记》、《塞上行程录》等游记。因此,在游山乐水这一点上,许同莘与傅增湘具有共同的志趣和感受,互相交流巡游心得或者结伴而行,都是十分自然的。

但该函值得我们注意的,则不仅仅是作者与傅增湘的交情以及其所著游记三种,还有他在附言里提到的《氏族谱略例言》及相关问题。在本函及夹寄本函的书中,都没有发现许同莘所说的《氏族谱略例言》,也许是在流传过程中遗失了。许同莘曾经精心编辑修纂《迁锡许氏宗谱》和《许氏谱述》,介绍本族由安徽歙县迁居江苏无锡的世系构成;又据《华氏统宗谱》和《锡山华氏族谱》而编成《无锡华氏谱略》^②,并撰写《无锡华氏谱跋》一文。这几部书中都没有许同莘所说的准确题为《氏族谱略例言》的文章,相比而言,似乎只有《无锡华氏谱略》与之更接近一些。但不论事实是否如此,许同莘在族谱编纂方面所投入的精力都值得我们注意,尤其是“比年来所专意采辑者,时彦所谓违反潮流者也”一句,更反映了作者对于族谱价值的认识以及他对纂修族谱的态度。

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时彦所谓违反潮流者”之所指,但联系到许同莘修纂族谱之事,大概应该指民国肇建以来,由于提倡民族主义而导致的对于宗族观念以及族谱价值的冲淡与贬抑。孙中山等人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之后,不少革命者或思想激进人士即以为宗族观念是与民族主义绝然对立的思想,是需要坚决根除的,从而体现并宣传宗族思想的族谱亦在清算之列。其实,孙中山先生在解释民族主义时,虽然曾经将其与家族主义

^①傅增湘:《傅增湘自述》,《辛亥人物碑传集》卷八,团结出版社,1991年,第433页。

^②原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八卷第四号,1934年。

和宗族主义相对比：“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①并认为家族和宗族观念的浓盛与民族和国族意识的淡薄，很不利于国家之统一与强盛：“中国人对于家族和民族的团结力非常强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至于说到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的。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已，还没有扩张到国族。”^②但同时，孙中山又认为：“我们失了的民族主义要想恢复起来，便要有团体，要有很大的团体。我们要结成大团体，便要有小基础，彼此联合起来，才容易做成功。我们中国可以利用的小基础，就是宗族团体。”^③这又在充分地肯定家族观念的作用。所以，孙中山最终还是将民族主义与宗族主义统一了起来，至少他没有完全否定宗族的地位。然而在事实上，由于“三民主义”思想的出现，使得许多人的确对传统的宗族意识产生了绝对否定的倾向，以至于民国期间的许多族谱，开篇都要先申明一下宗族团结与国家统一之关系。如纂修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之《车田卢氏五修族》谱序即云：“我汉族自黄帝以来迄今数千百载，均系一脉相承，其中虽经几度异族之侵入，然反所同化。是此可见，国家民族性之坚强，不为外族所夺。考之坚强原因匪一，殆有深刻之家族宗族观念为主要因素。晚近人士多不察其本，只知大倡民族自由而视宗族团体为无物，是与登崇楼而自戕其基何异。”纂修于民国三十二年之《醴南田心刘氏八修家谱序》也说：“矧今日民族主义高涨之秋，各图谋独立自存之道，苟不能团结之，将何以发生力量以御外侮乎？我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系由一个民族所以结合而成，故有扩家族而为国族之主张。然则家族之重要可知矣。当此抗建紧张、戎马倥偬，吾人固当处战时如平时，对于谱牒尤当务之急。”许同莘与傅增湘都是由清人民之人，他们对于民国所出现的一些反传统思想与行为，一定是有许多不适应的。热心于族谱之修纂，既是许同莘个人兴趣之所在，其中恐亦体现了他不顺随潮流之心理。

四、王祖彝致陈垣

昨呈拙著《疆域沿革录》，顷又发现错误两处俱在序中：一为少文卧游，误为宗慤；一为顾祖禹著《方輿纪要》，误为亭林。当时未及深思，率然属稿，致成大错，可笑也。敬乞代予改正，免为识者所讥。幸甚，幸甚，专此敬候援庵先生刻祺。 王祖彝谨启 九日

按：此则信稿夹附于陈垣先生原藏之《光绪增改郡县表》，用“念伦用笺”之专用信笺书写，为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④所未收。

①孙中山：《三民主义十六讲》，《孙中山文集》（上），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61页。

②同上。

③同上，第114-115页。

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书信人王祖彝(1889—?),字念伦,一字俨伦,号天叙,河北文安人。宣统三年京师译学馆毕业,奏奖举人,七品小京官。民国元年,经铨叙局考验,作为高等文官初试及第,分发教育部学习二年,借补普通教育司主事。四年,叙官授中士。六年派赴福建、江西等省视察学务。十七年,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员^①,后又任文书组(相当于今秘书科)组长多年,见证了北平图书馆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期间的若干重大事件。十九年起,兼任北平华商电灯公司秘书。历充黎明中学国文教员、北平市立体育专科学校史地等科教员。曾先后获教育部四等奖章、三等一级文杏章及八等嘉禾章。著有《三国志人名录》、《中华民国疆域沿革录》,与胞兄王祖绎共同编纂《文安王氏宗谱》。其《三国志人名录》1935年交由商务印书馆,版已排竣而未印行,直到1956年才得以出版发行。该书是《三国志》及其裴注人名索引的重要工具书。

《文安王氏宗谱》于1933年开始修纂,1935年完成,1936印梓。由谱序、世系源流、世系、齿录及兆域图说、莹田记、族居记、考订、丛述、序例等组成,其体例之详善,洵可为谱学之法。世系部分有王祖彝之生平小传,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他的最详尽资料。王祖绎及王祖彝分别所作的后序,均提及在修纂及定稿时,王祖彝以其供职于北平图书馆之便,大量参阅了馆中所藏的方志、族谱及历代朱卷履历。可以说,北平图书馆于《文安王氏宗谱》之高水平修纂是大有裨益的。作为主要的得益者,王祖彝当然更有体会,所以,在谱修成后,他就代表修谱机构向北平图书馆敬赠一部,并另纸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敬希国立北平图书馆惠存

文安王氏修谱事务所赠

北平西铁匠胡同三十四号王念伦代寄

还在落款处钤上了“王祖彝”的朱方印。该书连同王祖彝的便条,现在完好藏存于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

王祖彝致陈垣信中所说的《疆域沿革录》,即其所著《中华民国疆域沿革录》,1935年4月由集成印书局和五典书局分别印刷、发行。全书分省县两级,说明截止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底,全国二十省、八市、二行政区、二地方、一千九百三十三县与清代相比之疆域沿革情况,资料翔实而叙述简明,顾颉刚称赞其“足为我研究沿革地理之同志解决困难不少,是必读本志者所乐闻也”^②。此书在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现藏六部,王祖彝信中所说的两处出现在“自序”中的错误,即误“少文”为“宗慤”、误“祖禹”为“亭林”,该六部皆以小纸片覆盖改正。也许当时作者在北平图书馆任职,改订馆中藏书之误较为

^①此据《文安王氏宗谱》,而《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下)(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所附“工作人员名录”则记,王祖彝1929年1月至1949年在职,其任职起始时间比《文安王氏宗谱》所记时间迟后了一年。

^②顾颉刚:《介绍〈中华民国疆域沿革录〉》,《禹贡》1935年第6期。

便利。而分送师友部分,则不及一一纠改,只好请对方代为厘正。我们不知作者给陈垣先生赠书是否与陈垣曾经长北平图书馆有关,但他特请陈垣先生代为改正书中的错误,既体现了对陈垣先生的尊重,也反映了他对学术、对读者的尊重。

据《中华民国疆域沿革录》的撰写与出版时间推断,此信大致书写于1935年4至6月间。比较奇怪的是,它不是夹在王祖彝所说的《中华民国疆域沿革录》中,而是在陈垣所收藏的另一种书中。王祖彝呈赠陈垣的那部《中华民国疆域沿革录》不知今在何处?

五、〔〕端致朱启铃

桂老尊鉴:昨承枉驾倾谈,极慰。承嘱检阅潘文茵略历及李云庵事,兹得其大概,如别纸所书,聊备参考。敝处所得黄中丞寿诗册,其中有陈定斋诗余,多黔中康熙时绅士,容暇携奉。久阅原书暨尊处书目,并奉缴,专此即请道安。乡晚生 端谨启 十七日

再查《初白集》中亦有黔中诗,又阮文达、桂未若两公集亦应有诗文,如尊斋无诸集,可一查。

按:这通函札粘贴在抄本〔乾隆〕《贵州志稿》的扉页,并用印有“甲戌新秋越园为荣宝斋制”的信笺书写,并印有“越园”朱记。收信人为朱启铃(1872—1964,字桂辛,贵州紫江人),但致信者是什么人呢?根据“乡晚生”的具名,可以推测此人应该是贵州籍。在该书的首页,除了“紫江朱氏存素堂所藏书”的藏书印外,还铃有“普定姚大荣字俪桓号芝澧金石书画”朱印。姚大荣(1860—1933),贵州普定人,倒是与朱启铃同乡,但其名、字、号皆与“端”无涉,年龄也比朱启铃要长十几岁。晚清民国以来号“越园”者有学者、书画家余绍宋,但他是浙江龙游人,与朱启铃无同乡之缘。因此,书信人暂时只能存疑待考。

《贵州志稿》分《黔省开辟考》、《黔省功德名臣考》、《苗獠种类风俗考》,作者为乾隆时期贵阳籍人潘文茵。其中,在《黔省功德名臣考》卷后,有后学李云庵的识语:“娓娓数千言,叙次历落,断制分明,非熟于史笔,未易臻此。”其资料多取《贵州通志》,而裁取诠叙可观,是一部简明的贵州历史大事记、人物传和风俗图。

朱启铃生前热爱家乡,关心乡邦文献的保存与收集。他先后编印了贵筑诗人傅寿彤、杨剑潭的诗集《淡勤室诗》和《芋香馆诗》,手抄了《开州志补辑》,收集了诸如明代马士英《永城纪略》、清代陈法《河干问答》、贵阳知府刘书年《刘贵阳遗集》以及贵州其他州县的方志^①。这部抄本《贵州志稿》或者是朱启铃倩人手抄,或者是从其他渠道展转得到,都足以说明他对该书的重视程度。而且他不仅收藏本书,还认真地阅读,并就其中未明之处虚心向他人请教。上

^①罗马:《爱国爱乡朱启铃》,《贵州政协报》2004年4月20日。

引信函就是专为回答他所咨询的关于《贵州志稿》作者与眉批者潘文芮、李云庵两人的情况。

六、郑恒谦致张涛卿

涛卿仁兄先生赐鉴：顷奉二月十七日颁来萧翰，内示各情，敬悉种切。承囑代购元江志书壹部，自应如命办到，惟以敝地此项通志早年印刷过少，不敷分散，且为日既久，大多拉杂遗失殆尽，寻齐一部，俱属困难。过去存有数部完全者，各被来往官员借去考阅，从无一归赵者，以致无法购获。有负盛意之处，伏希垂宥是荷，馀不赘述。专此布复，敬请财安，余惟朗照不具。弟郑恒谦谨覆 三月廿一日

按：该函贴附于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所藏〔民国〕《元江志稿》首册之扉页处。致信人郑恒谦之生平仕履未详。收信人涛卿即张涛卿，字传荪，江苏武进人，为民国期间江南重要藏书家，解放后曾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对该馆古籍之收藏与整理贡献良多。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所藏的地志类古籍中，也有不少即其原藏。粘贴有这通信函的《元江志稿》亦为其旧物。在书中，多处钤盖了“张传荪印”、“涛卿审定”、“武进张涛卿字松巢长寿印信”、“曾藏苏州张涛卿处”、“家住吴阊松坞”、“张多宝古稀后读书记”、“武进张涛卿字松巢号雪庐吴阊松华坞藏经籍金石书画印”等朱印。

〔民国〕《元江志稿》，黄元直修，刘达武、娄际泰纂。黄元直，字砺汝，四川万县人，民国八年（1919）任元江知县。刘达武，字粹叔，邵阳人。娄际泰，字赓颺，昆明人。刘、娄二人先后任元江县公署总务科长。《元江志稿》于民国十一年成书付梓。正文分地輿、建设、自治、食货、教育、武备、职官、祠祀、人物、列女、种族、艺文、杂志等十三门类，子目四十九个。该志不仅引用古籍文献史料，还采用了大量的官府档案，订讹误，补遗阙，更注重对于近代时局变迁、政治变换有影响的重大事件的记录。尤其是其中的人物、种族两部分，对研究元江历史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该书之卷三“建设志”，张涛卿抄录了明代李中谿《云南通志》中关于元江军民府的沿革记载，并注明抄录于壬午（1942）屈原节，在卷二十四前之空页处，又抄录了《忍古楼集》中关于元江人士张赞卿的一段文字，且注明是辛巳年（1941）闰六月为躲避敌机轰炸而客居于昆明期间所写。根据这两条材料，可知此书最迟于1941年阴历六月已经在张涛卿之手，那么，郑恒谦写信的时间应该在此之前。从信还知，张涛卿托郑恒谦求索《元江志稿》已经无望，既如此，这部《元江志稿》又是从何得来的呢？而张涛卿在战火之中保留下来的文献，最后又转归了国立图书馆，这恐怕也是他保护文化典籍、嘉惠于民族文化事业的精神反映。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

不編列但擇有年世誼共述之除開銷以當安四家揭
必不徒多耳

賜示二本款鈔好欣可稱詩史改而仍錄上凡筆与寸力必
排擊含風霜也之廣居同志諸人房和男近仍居肝微妙事
移居後孫公園一宅子月租松金侯拔秀 朝芳後即地
今居處山被逐大白 慈聖之壽本已漸長而自于秋又
踪初冰王幼雲天德之謂共与張蔭松共以儒洋侯中令
或可修多此宴宴區有子手宿在一切而榮剛我同老与

文见第 126 页

男紹箕跪稟

父親大人膝下謹稟者前月

母親啓行之後男曾素安稟想早呈

覽月初年別處上

母親素論教養一切平順抵家後當均安養不勝慰全

陳錫卿元來未到

手諭曉諭之下驚論

大伯母大人素養之佳殊深痛感現擬本月擇日回而市以向

文见第 126 页

肖肖老伯大人侍石叩手

手示承

賜張章感誦之餘謹以手報幸

勿哂之藥地圖亦水蔣澤山靈見一抄本精妙之正

與此本同或謂印亭林先生郡國利病書之首冊

中冊口秘書首列 呂祖氏語當非古籍并以此

少餘跋雙聲肅敬

道福

天東有韻字 必期丁丙

之不滿意必含滿而上月夜 上為手諭教養甚精切謹
福不可同以此處之安其佳 靈其被孫甚急當以極軸
處之同窮論諸人頗憤而太近平肩則則亦有詹名霸
望又拉目是時有剛凌名目之目 同自法剛後而諸
腐之而自更夢氣然一幅之入一 達師思遠不以此
氣運三以何也徐子靜云草疏請定國是謂如守舊則
而吉用守舊之人以剛刻宜吉剛刻之人 止於大局情勢
極而而足日 慈聖遠 必免榮福亦不須先定之意也

文见第 126 页

文见第 129 页